

为房子而牺牲 “房奴”的出路在哪里?

核心提示

近来,一部直面现实的都市题材电视剧《蜗居》在全国热播,《蜗居》以“房奴”等话题为切入点,讲述白领蜗居牛居无定所,拼命赚钱买房的故事,道出了市井小民的卑微心声、中国人惯有的“地主情结”,以及都市人面临种种生活难题和诱惑时不同的选择,引起社会强烈共鸣与反思。

《蜗居》演绎“房奴”现实悲剧

《蜗居》一剧描述来自乡下、有复旦大学高学历的女主角海萍和丈夫在大城市奋斗的心酸故事。海萍和丈夫在租来的小房子过了5年。为了买房,夫妻俩极尽节俭,连每月33元的交通费都想尽办法省下;鸡蛋不舍得买,连吃包方便面都成了奢望;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,弄得孩子几乎不认识父母。为了房子,海萍夫妇背上了高利贷债务,妹妹海藻为了帮姐姐还高利贷,甚至走上“职业二奶”的道路。

“我就是同海萍一样的人”“我就同小贝一样活着”……身处房价高歌猛进的2009年,无论是购买首套住房的“刚需”,还是因生了孩子购买改善性住房的父母,房奴们对于这部电视剧可谓“心有戚戚焉”。

“里边的故事太真实了,让人无法回避,欲罢不能。”在北京漂泊的陈阳敏夫妻俩感慨地告诉记者。已经“奔三”的陈阳敏夫妻每月收入不到8000元,每月除去伙食、房租、水电、交通费,剩余的钱根本不够抚养刚满1岁的孩子,只能将其放在海南老家由父母照看。北京朝阳区的漂亮楼盘,夫妻俩望着几年仍不可及,“租房多年,对房东忍气吞声,受尽委屈。想买房,看看每平方米3万元的房价,我们的存款也许只够房子的一块瓷砖。海萍做房奴不幸,我们这些做不了房奴的更不幸。”

“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”,“如果30年还完贷款,利息都滚出一套房子来了!”《蜗居》中这样的经典台词很多,而其最能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还是海萍的那段话,“每天一睁开眼,房贷6000元,吃穿用住2500元,孩子上幼儿园1500元,人情往来600元,交通费580元,管理费三四百元,煤气水电200元,我每天至少得进账400元,这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”,一语道尽不少都市人的心酸煎熬。

海南一行政单位科员小张告诉记者,海口房价虽不如上海高,但均价也近5000元。小张买房的首付款是“啃老”得来的,他每月的工资扣掉房贷和其他开支,余钱不到500元。“为了供楼,我担心失业,害怕家人生

病,不敢吸烟不敢喝酒,连别人请客吃饭都不敢去,怕还不起人情。”

网友“岁寒”说,在大城市中,如果不是本地人或者原先就有房的人,不啃老、不借钱、没外财,完全靠自己的工资买房,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《蜗居》中主人公一波三折的买房奋斗史,真实反映了都市无房族的困惑和房奴的苦楚。

为了房子,你要牺牲多少?

房子、爱人和孩子,是一个家温馨的要素,但高房价将之化作一把辛酸泪。

当有人质疑《蜗居》的台词“很黄很暴力”时,《重庆时报》一篇评论指出:凌厉的社会现实比台词更“露骨”。“我们的生活就被演绎在剧中,被揭露得一览无余。”网友“令狐的粉丝”说。

网友“叶子”之前也有一个像“小贝”那样疼她、一心想和她过小日子的男友,相恋7年却以分手收场。原因很现实:对方买不起车子房子。“叶子”说自己虽然不会为了生活成为“小三”,但完全可以体会“海藻”的心态。虽然大部分网友都批判“海藻”太物质,但也纷纷举出了身边不少情侣迫于生活压力而分手的例子。

“好工作不如好爸爸”、“做得好不如嫁得好”,大学4年这些话我听了无数遍,工作后更是体会深刻。”海口白领张晓美告诉记者,海口楼市今年回暖后房价急升,由于父母攒了几十年积蓄不够做首付,自己只好拼命工作,整天累得苦哈哈,脾气也越来越坏,与朋友日渐疏远。不但如此,原本只想“为感情结婚”的她还重定了择偶目标:嫁个有钱人。“我知道靠别人解决问题的态度很浮躁、急功近利,但没有房子我父母心里不踏实,月薪1000多元的我要追赶房价太难了!”

这些充满焦虑的话,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嘴里吐出来,难免让人心惊。为了

房子,我们要牺牲什么、牺牲多少才算够?

饰演“海藻”的演员李念受访时说:“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正在走‘海藻’的路。其实海藻是一个‘警示灯’,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些警告和启示。特别是正在经历人生抉择的人,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不要因为一时的诱惑而将自己的人生葬送。”

《蜗居》导演滕华涛指出,“《蜗居》表面上讲的是房子,但实际上房子只是一个符号,代表了物质方面的诱惑。很多人都觉得妹妹海藻的命运太惨,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会怎样,其实都是价值观的模糊,他们没有想明白当你一旦走上这条路,那个结果已经是注定的。”

网友“jiangjun32”也持相同看法,认为真正让剧中人物灭亡的是每个人被房子引出来的强大欲望。“这些欲望使得这些人一步步走向深渊却无法回头。当惨剧发生后,我们才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老话:知足常乐,平淡是福。”

拥有房子才算拥有幸福?

进入岁末,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飙升惊人,远在南端的海口、三亚等二线城市的房价也如火箭升天一般往上蹿。2009年最新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上,海口位列28位,新房均价达5037元/平方米,二手房均价4533元/平方米。

东方网正在进行的一项“你的申城‘蜗居’状态”的网络调查显示,受访者中七成以上目前连“蜗居”都不够格,属于“蚁居”状态。近日,南海网记者走访近百位25岁到30岁之间的海口市民,70%的受访者表示,自己尚未购房或不具备一次性付清房款的能力,其中又有过半的人称,如果买房需要“啃老”来解决首付。

《蜗居》已成为当代人思考生活和自我的一面镜子。正当无数的房奴和无房族为

《蜗居》万分纠结时,一些不同的声音也在回响:买房子等于买幸福吗?除了当房奴,有没有其他出路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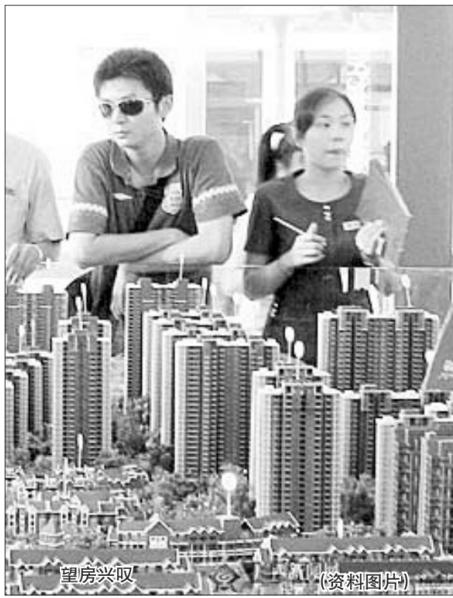
一些学者撰文指出,《蜗居》乍看是高房价导致了主人公海萍遭遇了生活中的诸多不幸,实际上还有错误的买房观在作祟。海萍的房贷6000元是远远超出她收入的35%了。这说明房价过高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是她没有量力而行。本来没有那个能力还要跟人家买的一样,到头来不仅自己和亲朋吃苦受累,还把房价拉高了。

“如果海萍像我这样,先工作几年买个小平房,等房价涨到一定程度再卖掉赚一笔,加上后几年精心攒下的钱,买大房的首付不就凑出来了吗?且这时候的收入也比原来提高了,支付房贷的压力自然也小一些。这样岂不挺好的?”诸如此类的置业者在论坛中五花八门地“晒”出来,获得不少网友的顶贴喝彩。

“再说了,难道不买房子生活就真的没法过了吗?也不见得。”在浙江一家新闻单位工作的浩浩和静静夫妇告诉记者,浙江的房价如今已高不可攀,每平方米少说上万。他们年收入虽然过万元,但是比起房价的涨幅还是相对慢许多。假如当房奴,他们的生活质量肯定要严重下降。因此他们结婚伊始就商定租房过日子,多年来不但保持着高品质的生活水平,每年还有足够的余钱在国内外旅游,生活过得非常潇洒。

的确,在当今中国当房奴的不少,买不起房子的人也很多。在房价高企,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生存压力空前高涨,幸福感急剧下跌的时候,为房子困顿的男女老幼应该反思:既然房价如此高,为什么还要执着?正如一些“旁观者”指出的,如果劳碌20年只是为了养房子,生活也失去了意义。“没有房子不等于人生失败,有了房子也未必拥有幸福。”换个角度看问题,许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

据新华社



望房兴叹

(资料图片)



为拥有一套住房,很多人不惜成为房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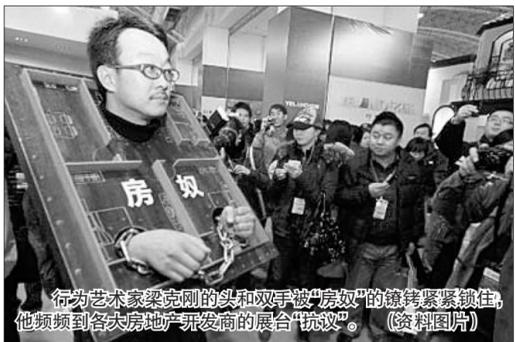


陶刚绘



《蜗居》拍摄画面

(资料图片)



行为艺术家梁克刚的头和双手被“房奴”的镣铐紧紧锁住,他频频到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展会“抗议”。(资料图片)

处级干部买车八折优惠让人焦虑

请不要埋怨4S店的“处级广告”让人不舒服,其实,人们的不适感并非来自促销广告,根源还在于公众对权力失范的焦虑与警醒,以及社会对权力监督细化升级的自发渴求。

12月1日《扬子晚报》报道,“市县处级以上干部(局、厅、处、院、所)购买该款车型的,将享受八折优惠;新闻媒体单位购买该款车型的,可享受九折优惠。”日前,宿迁市区某4S店在当地媒体上精心推出了这样的系列优惠广告,活动一经公布,其广告的雷人效果即时引发公众热议。

平心而论,不是这则广告雷人,而是我们对类似“处级广告”历史性过敏。宿迁4S店的这则广告是很容易让人引发联想的,比如当年某烟草广告大叫“厅局级享受”,结果搞得大家很不爽,一边埋怨烟草公司看人下菜碟儿,一边顺道把倒霉的周久耕从“厅局级享受”中拉下马——但那个广告本身的合法性值得商榷,和眼下的打折促销是两码事。

之所以说4S店的“处级广告”引发热议是公众过于敏感,道理有两个:一是在市场经济下,衡量交易行为的准则无非还是公序良俗,4S店不是公权部门,拿来促销的也不是公共资源,从市场理性来说,别说它对处级干部打八折,就是整车大赠送,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;二是从这则广告看,属于典型的分类营销,差异化价格取决于差异化的定位,这就好比不少夜场对女生免票一样的道理。再说,汽车也不是垄断行业,属于充分竞争领域,更不像柴米油盐缺乏需求弹性,你看不惯完全可以不买,或者起码可以不在这家买。

其实,公众的担心恐怕有两个:一是担心某些官场很讲究礼尚往来的“传统”,4S店给处级以上的干部抛了个媚眼,那么,处级以上的干部是不是也该以权力资源对其“回眸一笑”?比如各地频出的土地腐败窝案,就是遵循的这个逻辑,开发商对地方官员“孝敬”一点,地方官员就可以拿招拍挂的土地当礼物,不同折扣地“回礼”过去;二是担心优惠广告会不会激活某些部门公职人员换车的欲望。超标公车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,比如不久前网上流传“河北邯郸免过路费名单”,竟顺带着牵出某些局长名下有数台特制公车;再有就是贫困县的女检察长找啊找啊找朋友,一找就是“百万豪车任你开”的朋友——公车治理下的凡此种种,让人不得不生疑:公款买车用车的“标准”究竟在地方上有多大的执行力?如果买车用车随心所欲,权力部门会否对4S店的“处级广告”心动之后再行动?

请不要埋怨4S店的“处级广告”让人不舒服,其实,人们的不适感并非来自促销广告,根源还在于公众对权力失范的焦虑与警醒,以及社会对权力监督细化升级的自发渴求。 妍芳

也许偏才怪才早被淘汰了

北大之所以招不到“偏才”“怪才”,是因为在目前教育模式下,“偏才”、“怪才”的成长土壤是贫瘠的,侥幸存活下来的也步履维艰。

今年北京大学尝试中学校长推荐来选拔招生,成为持续的热点。11月30日,北京大学招办对初审合格的90名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,而公众发现,全国39所中学推荐入围的这些学生,鲜有“偏才”,更无“怪才”。

笔者认为,推荐“偏才”“怪才”接受高等教育,在现阶段这种教育背景下,一般来说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期待,因为在目前教育模式下,“偏才”、“怪才”的成长土壤是贫瘠的,他们应该很早就被淘汰

于这种教育体制之外,侥幸存活下来的也步履维艰。

什么是好孩子,什么是好学生?“听话”、“爱学习”、“成绩好”、“不闹事”,这些字眼恐怕是他们最主要的标签,不管是家长,还是学校的教师、校长,都会这样认为。

推行素质教育,目标应该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大多数孩子的闪光点,可惜,不管学校还是家长们,往往都是以分数论英雄。在“抓高考要抓出血来”的教育背景下,成绩不好,老师们很难再去用心来关注和栽培你,哪里还能成什么“千里马”?

那么,“伯乐”们能否去寻求改变?中学以至高校能否去寻求解决的办法?当

然,如果大环境不变,不仅仅每迈一步都很难,而且迈出去一步效果也不见得怎么样,比如此次北京大学由中学校长推荐自主招生的初衷,是选拔“综合素质优秀、特长突出、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”,这里面显然包括“特长突出”的这部分“偏才”、“怪才”,但最后结果大家都看到了。

好在现在环境提供的选择多了,“偏才”、“怪才”大可不必气馁。不能在国内被推荐上名校,条件具备可以到国外读名校;读不了名校,可以读一般的大专;即使上不了大学,你可以读读通社大学,或者自学,“天助自助者”,借由自己的努力,或者他人的帮助,成才的路总有千万条。 王原



为政府说话

11月30日,吉林梨树镇政府在拖欠承包商工程款的情况下,和警察剪断了承包商设置的门锁,强行入驻对方承建的新办公楼。记者采访时,遭警察粗暴阻挠,一名工作人员还“训斥”记者:“这事你应该向着政府说话”(12月1日《新文化报》)。

官话牛言演大戏,编个小品还有余。替谁说话犹在耳,如今又闻命令句。看似越来越霸气,实则愈讲愈空虚。亏心已是事实,牛言反而揭老底。 李军 配诗 刘道伟 漫画

“刁民”与为政艺术

以及为政能力。

在拆迁者的眼里,唐福珍是典型的“刁民”,在这里,“刁民”的意思就是不跟政府合作,漫天要价,破坏当地经济发展,威胁当地大多数人经济利益的少数人。对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“钉子户”,就要以狂风扫落叶的态势,将之连根拔除——这样的思维和逻辑,散见于一些管理与被管理的现场,他们理直气壮地侵占公民的财产,所秉持的理由就是经济建设,社会秩序,公共利益。

不可否认,在政府拆迁与补偿这样的拉锯战中,每个人的想法和要求都不一样。政府不可避免会遭遇到各种特殊

情况,事物总不都是按自己设计和规划好的路线在走,简言之,总有这个或那个“刁民”在路口等你,狭路相逢。为政艺术,就是化解一次又一次的风波,化解之道,肯定不是硬碰硬。

如果“刁民”在台下前赴后继地出现了,那么一定是政策或者政策的执行出了问题,化解“刁民”的底气,是最高层次的为政艺术,无论如何,人的生命这条底线是不能破的。具体到唐福珍事件,是当地官员执政能力低下的直接表现,我们痛惜的是,还要有多少流血事件,才能把这些为祸一方的低能管理者清除干净? 河马

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一样正常

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,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,“管群”矛盾难以调和,在此情况下,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都很正常。

12月1日《信息时报》报道,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,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,是被打商贩的100倍。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,而不能仅仅是“廉价的同情心”。

孙金龙副主任说城管被打人数是商贩被打人数的100倍,可能是情绪激动之下的夸张之辞——在新闻后面的跟帖中,有网友说,仅今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广州市城管打人事件就有3起以上,而城管被打新闻则寥寥无几,“100倍”之说让人如何相信?

其实,在现有城市管理制度之下,商贩挨打是必然的,城管挨打也是正常的。换言之,以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,如果商贩与城管能够相安无事,没有打人事件发生,那也可以成为新闻。

城管为什么要打商贩?举例来说,有的城市为了迎接“创卫”检查,要查封一些沿街店铺,领导便将任务交给城管部门。合法经营的店铺要遭强行关闭,这是哪门子道理?店主们自然不服,城管执法必会遭到强大的阻力,城管若不“狠”一点,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,完不成任务就无法向领导交代,就要受到批评,就要被扣奖金,甚至要被辞退。怎么办呢?唯有暴力执法。

商贩为什么要打城管?原因更简单了,商贩作为弱势群体,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,大多习惯于逆来顺受。但人人都有一点血性,当城管踢他们的摊子,没收他们的物品,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时,一些商贩便唯有抗拒,一时冲动之下暴力抗法也是可能的。请注意,人们为商贩的境遇鼓与呼,体谅商贩的艰难抗争,这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情感并不“廉价”,而是非常可贵。

实际上,我们一直说城管“暴力执法”、商贩“暴力抗法”,而城管抗的是哪个法,商贩抗的是哪个法却长期“无法可依”——这也是城管制度最尴尬、最受舆论质疑之处,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细化城管明确的执法权限,甚至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为现行的城管制度正名。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,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,“管群”矛盾难以调和,在此情况下,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都很正常。

所以,有的地方城管形象不好,经常遭到批评、指责,并不是舆论刻意抹黑,而是一些城管自己没有做好;而一些城管做得不好,是因为在某些不合理城管制度下,城管工作几乎没法做好,没法既让上面满意又让下面满意。这正如许多有识之士多次呼吁的: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应该完善。 晏扬